

厉以宁：中国经济走势是 L 型，2017 年不会有大起色

最近一些小煤窑又恢复生产，钢铁销路变好，但经济拐点还远远未到，未来中国经济更多还是 L 型，厉以宁教授这样认为。他建议对古典经济学提出改进，并提出一系列新观点，例如仅靠合并生产要素不会有创新，创意、创新、创业必须联系在一起；未来不需要企业家，而需要创新者和领跑人；失败不是成功之母，成功才是成功之母；相比起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网络时代创新创业对资本的要求有所降低等等。



■ 北大光华名誉院长 厉以宁

第一个问题是当前经济形势。

“不要轻易谈拐点，L 型更符合当前现实。”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是保持在 6.7% 的水平，但绝不能认为我们的经济到了拐点。什么叫“拐点”？就是从现在

的经济下行步入一个长期、平稳的发展阶段。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最近煤的价格上涨，很多小煤矿又恢复生产了。钢铁价格上升，销路也比较好。

之所以会发生这些情况，主要是因为目前企业的确需要去库存，为了保证自己的生产持续进行，必须要增加生产资料的

储备料。生产资料的储备本来是在减少，但物价只要一开上涨，储备就会跟上，因为再过一段时间这些生产资料就更贵了。所以就导致了煤炭、钢材价格的上涨。

这是正常现象，但并不意味着经济下行压力已经减轻。要知道经济转型绝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谈“拐点”。明年仍然是在一个“稳中求进”的阶段，经济不会有大的起色。U 型、V 型都不是今后会出现的情况，很可能仍然是一个 L 型，这是符合当前现实的。

第二个问题是创新。

“生产要素的重组不足以创新，需要信息的组合。”

二十世纪流行的经济学术语中，最广为人所熟知并广泛使用的就是“创新”二字，从熊彼特提出“创新”的概念到现在已经整整一百年，他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熊彼特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工业化刚开始不久，如今很多情况都已改变，所以需要改进。

举几个例子，第一个，熊彼特说“创新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在当时是对的，因为工业化时期，制造业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他没有预料到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时代是后工业必然要经历的阶段，目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非就是创新，不掌握和分析最新的信息，光是靠生产要素的重组，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这一点已经被信息化时代所鉴证。两个企业一合并就能够创新吗？那就要看信息量掌握到什

么程度，有没有真正新的因素在里面。

“企业家不是创新主体，创意更多来自年轻人。”

再举一个例子，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创新者，主要是因为他们能够把发明家的成果用到经济中去，这就成为了创新。”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对的，但是在当今信息化时代，这个观念是落后的。现在我们要把“创意、创新、创业”三个连在一起，要想经济能够创新，必须先有创意，先有创意的人并不是企业家，而是无数正在投入市场的年轻人。别小看那些创业咖啡馆和俱乐部，经常有人在那里讨论他的创意，一旦有了创意了，企业家就能够发现投资的机会。每一个大企业都能够创新吗？有些企业保守地维护既得利益，他们能否创新可不一定。

第三个例子，熊彼特的观点是：“你要创新创业必须要有资本，先筹资、融资，然后组成一个计划，再把发明家的发明应用到新的领域来。”这个观点不完全错，但是不够全面，因为他不了解网络时代给人们带来的影响。互联网使整个经济运转的速度加快了，一旦你有新的创意，得到这个消息的人会主动向你投资，而不用你去求别人投资，信息化时代跟过去是不一样的。

“失败不一定是成功之母，需要改变思路”

再举一个例子，古语有云“失败乃成功之母”，这个观念对吗？其实越来越不灵验。假如思路不改你要失败永远失败，要成功必须转变思路，成功才是成功之母。创新的过程中会出现无数的新的投资人和组织者。一旦成功了就会迎来下一个成功，一直到其他新的创意出来。

要知道今天跟一百年前熊彼特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那时候大量的年轻人都是体力劳动者，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今天大量涌入创新市场、创意俱乐部、咖啡馆的年轻人，都是有知识的人，他们会发现许多新的问题，其中也会出现失败者，但涌现出的成功者更多。

今天，整个经济运转的速度比过去不知道快了多少倍，我们正处在一个加速变革的时期，人的观念也要改变。我们曾这样想，你能够知道五十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子吗？总的方向可以讲，但具体的问题不能解决，因为时代变化太快了。五十年以后的消费是现在的消费模式吗？五十年以后的投资是现在的投资模式吗？五十年以后的就业是现在这种就业形式吗？那个时候就业者可能就在家里跟企业签订合同，他自己有计算机，能够跟你联

“

消费类互联网平台企业应该尊重和遵循制造业卓越品质和卓越品牌的基本规律，而不应以价格低廉、比价销售来吸引消费者，继而造成实体经济企业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

网就够了，你要什么软件他就在家里就给你研发出来。到那个时候，人们还会像现在一样身上都带着现金吗？人们出行还一定要自己购买汽车吗？随着时代的剧变，失败者和成功者同样在涌现，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转换思维。

可以这么说，未来时代“企业家”这个名词可能都不存在了，未来不需要企业家了，需要的是领头者，领跑人。一旦有新的发现，就会出现新的领跑者、新的带头人。所以创新是中国的大势、创业是中国的大势，我们的观念需要改变，因为我们所处的世界和一百年前熊彼特所面对的世界完全不同。

第三个问题是社会人和经济人。

“未来不止是理性人心理，更多是社会人心理。”

古典经济学重视经济人，经济人是完全从自己的经济利益出发来做决策。生产者希望成本最低，收益最大，消费者希望最低的价格能够买到最大的满足，这就是经济人的观念，所以经济人又被称为理性人，被奉为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惯例。

现在来这个观点依然适用，只是范围变窄了，不断地有经济学家对经济人观点提出挑战。凯恩斯就是其中一个，他认为在投资方面人们往往体现动物的本能，会做出冲动的投资。所以凯恩斯认为经济人的假设是不全面的。

凡勃伦的观点是，人们的消费不完全是为了物质上的满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需求，而精神上的满足催生了炫耀性的消费。比如一个人

明明没那么多财力，却一定要坐最好的马车，使别人觉得“这是一个有钱人”，他就感到满足，这种满足是消费能带来一种愉快的感知。常言道“吃是百分之百为自己，穿是百分之八十为别人”，这种心理是为了让别人以为你快乐并进而羡慕你。

西蒙认为最优的选择是达不到的，因为变量太多，目标又不单一，你怎么能同时做到多个目标最优化呢？所以人们只能做次优选择。比如一位女士买了一件披肩或者一件外衣，别人问她怎么样？她说“凑合”，她不会特别满意，因为她没有时间走那么多家商店，她不确定还有没有衣服比她买的还好。再比如，你买一根缝衣针，到百货公司卖针的柜台，想挑一个最尖的针，没有哪个傻瓜会自己带着放大镜，在这么多针当中逐一比较挑一个最尖的。看到第一根针不太尖，换第二根针有点弯，第三根针“行了，不看了”，做出次优选择。消费者做出次优选择，还算什么理性人呢？所以他提出了“优先理性”，这个观点现在越来越被广泛接受了。

在经济学里除了有经济人以外，还有社会人，社会人考虑的是社会问题。比如说有两个地方可以投资，A、B。A成本低效益高，B成本高效益低。一般按经济人的假设会在A投资，因为成本低。为什么偏偏有些人愿意到B投资？这就要分析了，我之所以到B投资，可能因为那是我的故乡，我对故乡有感情，所以我有钱的时候回到故乡去建一个医院、建一个学校、办一个工厂，增加当地的GDP。

还有第二种考虑，我之所以在B投资，因为我从小在那里学习、生活过，当时人

们瞧不起我，认为这家伙没出息。今天我发达了，我就在那里投一个工厂，投一个图书馆给你们看看。这也是一种社会人心理。

第三种情况，我之所以要到那里去投资，因为我在那里曾经做过一些不光彩的事情，比如当初我离开的时候欠了很多人的债没有还，我欺骗过一些人，找人家借钱没还就走了。心存内疚，今天我回来想起过去的亏欠，于是就在那里投资来弥补我过去的错误，这也是社会人心理。

现在我们经常讲一个企业之所以能够发展，一定是企业文化搞得好的，企业文化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培育职工的认同感。“同甘”和“共苦”是两个概念。“同甘”是企业走上坡路、形势好、红利多，怎么样分配这些红利必须有制度，如果制度不合理，修改制度以后企业仍然可以依靠制度做到“同甘”。“共苦”则必须有一种精神在支持着，靠制度是不管用的。工厂老亏损，工资两三个月都没发出来，这种情况下职工走了，怎么样跟他谈制度都不管用，但是如果企业文化做得好，整个企业有一种“共苦”的精神，大家抱团取暖就能共度难关。所以“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这就更加证明了发展社会认同感和责任感的重要性。今后社会不仅仅要在经济上发展，经济人假设在某些层面上仍然有用，但是社会人假设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如果大家都有一种社会公益感、社会责任感，我们的经济必定能够走向新的阶段。

（本文由厉以宁教授在“第三届大梅沙中国创新论坛”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陈玉宇：谨慎乐观看待中国经济

我对中国经济的观点是谨慎乐观，更长期看是乐观。中国当前的经济困难来自两方面：长期结构性力量和短期周期力量，最近三五年受到短期冲击的影响，但是中国的经济也在发生长期的结构变化。这两个力量造成了我们过去三四年遇到和观察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我总的判断是，未来五年，GDP增速会从今天的6.7%缓慢下滑，在2021年稳定在5.8%。虽然增长速度降低了，但我们的经济健康状况会变好。具体来看，推动中国经济短期增长的力量有消费、资本，也就是投资、出口。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消费增长对GDP的贡献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投资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前者是我们期望达到的，而后的比重将会有所恢复，经济增长结构会变得更健康。



北大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北大光华应用经济学系教授 陈玉宇

PPI 重回正值

造成经济困难的是长期力量和短期的周期性力量。短期的周期性力量去年已经见底，今年开始扩张和复苏，根据这半年来的数据，我认为我们经济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

很多悲观的人认为中国的数据有问题，感受到的困难比经济数据统计出来的困难要严重得多。从事制造业的人会认为去年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这个看法是对的，我们第二产业部门增长速度在2015年下半年零增长。一线的企业家感受到的企业零增长也是对的，不过由于中国的制造业产品价格平均下降了6%，所以0的名义增长率减负6%的价格结果就是正6%。GDP增长是制造业多生产了多少个数的东西，去掉通货膨胀之后，大家的感受跟统计局的数据不一样很正常。这个数字代表着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生产量增长了6%，销售额跟前年持平，这是

去年中国经济困难的表现。很多人在这种情形下，对于一些扩张性的货币和政策持有迟疑的态度，但是决策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避免这种困难局面。危机之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高，积累了过剩的产能和库存，给我们带来很多市场调整的压力。

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PPI价格指数开始负增长，2%的下降是可以承受的，但是2014年PPI雪崩式的下滑，就是大家明显感受到商品价格走低。到2015年年底下降6%，意味着很严重的经济衰退通货紧缩，这就构成了去年销售的零增长。今年PPI回到零以上，如果制造业产量增加6%，销售也会增加6%，与去年产品产量增加6%但是销售额增加为0是不同的。

关注民营企业

我们要注意国有企业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的装备

设备投资等增长速度从2013年的20%多缓慢下滑到2015年的10%。之前非国企的增速一直高于国有企业的速度，但是到2015年底民营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雪崩，某些企业接近零增长。民营企业未来不乐观，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然后就靠大商所的交易，这是很危险的迹象。而整体宏观经济好转是因为2015年下半年以来，决策者督促一些政策性的银行大力度地批准了各种项目进行，表示我们国有企业投资增长速度为30%，这种非常强的短期经济政策是必要的，避免了我说的多生产6%的东西销售额却是零增长的情况，使市场的供需状况发生变化。但是现在值得忧虑的是，只靠国有企业高速的投资增长速度是否可以持续，我们要谨慎地观察，决策者也在努力出台政策改变这个情况。

结构性变化背后的力量

1975年到2005年，随着人均GDP增

长，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农业占 GDP 的比重逐渐下降，制造业占 GDP 是先上升后下降，服务业比重会上升。造成结构性变化的力量有三个，一是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收入上升，食品占比越来越低，农业的比重下降。人均 GDP 每 7 到 10 年翻一番，需求结构会发生激烈的变化，生产结构也需要伴随变化。二是技术的变化，新的技术会使原来的产业结构变得不合时宜。三是时尚和偏好的变化，年轻人的消费结构不一样。

在长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因为需求结构的变化，农业占 GDP 比重会下降，这个过程很明显，从 2004 年到 2015 年十年时间农业占 GDP 下降 1%，这一变化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必须得到提高。但我国的农业比重已经十年不降了，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遇到了巨大的瓶颈。

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挑战

金融结构也出现问题。全部金融业从业人员的工资加上金融业提供的税收和利润，就是金融业的增加值。2005 年以前，金融增长速度略慢于 GDP 的增长速度。危机以来又迅速上升，现在金融业占 GDP 比重 9%，可 9% 的风险很难判断，用美国的金融业做下参考——大萧条时金融业占 GDP 比重 6%，萧条之后回到 3%，二战后伴随服务业的经济发展达到 8%，最近回到 7%，这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的比重。中国最近金融业占比迅速上升，有人觉得不可持续，有人认为经济崩溃了，金融业跟着崩溃了，这个比重也会下来。第三种观点，金融业的从业者深谋远虑，决策和监管者高瞻远瞩，让我们在 8%、9% 的水平上奋斗

未来十年，使得中国金融业更高质量地增长，而不是简单扩张。未来中国金融业占 GDP 的比重在 8%~10% 左右，还是比较健康的。很难想象我们从今天 9%，希望看到十年后中国金融业的比重达到 15%、35%，达到香港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金融业的改革发展是中国的重要挑战。

杠杆率危害被夸大

最近很多分析杠杆率的文章，夸大了目前杠杆水平的危害。实际上，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宏观杠杆率并不高。杠杆率是指家庭部门负债、政府负债和非金融企业负债之和占 GDP 的比重。中国的比重大概处于 230% 左右，这个数据放在世界范围内并不高。中国的问题在于近 5~10 年来比重上升速度太快。

当名义 GDP 增长速度达到 20%，杠杆率才可能下降，可是我们现在名义 GDP 增长速度是 7.8%。现在处于通货紧缩阶段，会增加债务人的负担，所以中国的负债比重高速增长。我们家庭的负债比重放在世界范围内是低的，家庭房贷、消费信贷都远远不够。我们家庭负债相对不高，因此金融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就是提供更多金融服务，改善家庭生活水平。

政府服务分两部分，整体政府的债务比重在安全线以内，2001 年开始到危机前，财政收入的名义增长速度是 25%，是收入增长最快的政府，连国债都懒得发，所以银行、市场都没有充分的短期国债可以作为交易的品种。但是我们地方政府要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短期债务的累积和压力，由于基建的投资在现在，而带来的收益要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因此中国基建的投资应该依赖于长期资本市场工具

的支持。

企业债务占全部 GDP 的 140% 左右，其中 60% 是国有企业，80% 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没有杠杆过高的问题。问题在于贡献 GDP 的 20% 的国有企业负债达到 60%，所以一个挑战是改革国有企业，另一个挑战是解决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冲突，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名义工资增长了 3.5 倍，但劳动生产率只增长了 50%，制造业企业全面感受到压力，盈利能力下降，财务状况恶化，这是长期的问题，需要慢慢解决。

汇率问题仍待解决

汇率问题从去年以来牵动每个人的神经。过去 40 年，美元发生过三次大的升值。第一次是 1978 年到 1980 年代初，背景是美国为了解决国内的经济矛盾，实行了史上最紧缩的货币政策，当时美国银行市场的拆借率是 21%，各国的资金涌入美国，美元的币值被高估，美元三年时间升值了 70%。第二次升值是克林顿时代，也被称作强势美元时期，美元升值 40%，这段时间的升值对美元来说是健康的，因为流动到美国的资金都是以获得美国的股权和公司管理权为目的的长期投资，不是短期的炒作。2007 年以来，大家开始不看好美国，所以有资金离开美国，美元贬值，之后发现欧洲比美国还差，资金又回到美国，所以这次危机期间美元波动比较大。从 2011 年底开始，美国货币政策对于美国稳定经济起到良好的作用，美元有比较强劲的势头，2012 年美元缓慢升值。2014 年下半年到 2015 年上半年，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升值 25%，这是美元第三次升值。

这段时间美元不断升值，意味着我们出口负增长。这就造成资本市场的混乱，

美元可以对世界主要货币升这么高，人民币可不可以伴随着升这么高，市场上很多人预期，中国的宏观经济很微弱，改革挑战很多，经济增长前景没有那么硬朗，所以人民币有可能不能维持对美元的相对稳定，人民币对美元会贬值，这样预期就会先卖掉人民币，换成美元资产。

造成我们外汇波动的是，2014 年以前中国国内资金市场的利率 10% 以上，而香港、美国的资金市场利率是 1%~2%，因此很多国有企业、有关系的地方企业、民营企业就到海外借便宜的资金，有八千到一万亿美元。人民币要对美元贬值，这些企业就着急提前还款，造成短期内资金的巨大外流。对这个问题眼下没有好的办法，汇率问题的危险程度被过度高估，衍生成中国经济一团糟，人民币要大贬值。但是我们的确有问題，没能建立起人民币跟美元更加浮动的汇率安排，如果我们希望跟美元建立浮动汇率，就意味着我们要有外汇交易市场，通过外汇交易帮助我们进出口商锁定风险。

长期乐观的理由

尽管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长期来看我认为中国很乐观，有三个理由。

第一，20 年后中国将有十亿人工作和生活，还包含了没有户口的农民工，农民工等待着把家人接到他工作的城市去。第二，中国十年之前从低技能劳动力过剩的经济体转变为高技能劳动力充裕的经济体。第三，我们现在人均 GDP 相当于美国的 20%，与 1953 年日本经济起飞的时候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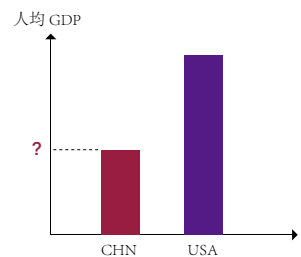
具体来看，1990 年中国出生了 2400 万人，从 1990 年到 2015 年的 25 年间中国出生了 4 亿人，这 4 亿人正在进入劳动

力市场，正在做两个决定，就是在哪个城市、在哪个行业工作。未来 20 年中国的任务很有挑战，中国需要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把这 4 亿年轻的劳动力配置到他们希望去的城市和岗位上，如果劳动力市场完成这件事，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就解决了，今年解决好 90 年出生的两千万人在合适的城市、在有前途的行业就业，明年解决好 91 年出生的，未来 20 多年解决好 4 亿人，那时候中国人均 GDP 可以达到美国的 40%。

70 年出生的人只有 3% 上大学，80 年出生的人有 7% 念大学，但 90 年出生的小孩有一半将获得高等教育。因此推算出，未来 20 年每年增长 700~800 万大学生，未来 20 年将累计增加 2.1 亿大学生。这就从劳动力素质方面，为中国走向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从中等收入迈向富裕，从产业结构依赖于制造业慢慢转向依赖于高端服务业的结构变化做好了准备。

总结

我预测服务业未来五年会上升，制造业会缓慢下降，农业我希望下降得快一点，但前提是农业的生产效率要改进。2021 年经济增长前景是 5.8%，悲观一点，如果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好，跌到 3% 也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2015 年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但是全世界经济增长中接近一半的力量是来自中国的贡献，中国对世界非常重要。周期性因素可能会发生，但是我们结构性的问题，每个人都应该深谋远虑，适应这些结构性的变化，政府的政策应该促进这些结构性的变化，这样我们会迎来更健康的发展环境，民众收入会改善，中国会迎来比较健康的增长速度。



今年解决好 90 年出生的两千万人在合适的城市、在有前途的行业就业，明年解决好 91 年出生的，未来 20 多年解决好 4 亿人，那时候中国人均 GDP 可以达到美国的 40%。

2021 年

2021 年经济增长前景是 5.8%，悲观一点，如果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好，跌到 3% 也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

特朗普上台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影响深远的重要双边关系之一，亦是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备受关注的话题。2016年11月，地产大亨、亿万富翁、真人秀明星特朗普出乎意料地当选美国总统，而他从竞选开始他就频繁地对关于中国的问题大放厥词，他的当选及未来他的政策对中美关系将产生何种影响？



何亚非

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中国前 G20 特使、北京大学燕京学堂特聘教授

我觉得有几点。

第一，中美关系确实非常重要，而且两国的基本关系没有变。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就是在双边经贸领域，我觉得贸易方面摩擦会增加。

第二，在全球治理的领域，如果我们听特朗普所讲的，他要废除 TPP，他要对美国原来就“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所做的承诺要往后退，这种情况对中国是一个考验。这个时候，中国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准备参与引领全球治理。那么这个旗子你自己一家扛，扛不扛？是不是还要劝美国人跟我们一起扛？这又是一个考验。

第三，在意识形态领域，我认为可能矛盾会下降。就特朗普本人来说，他对意识形态方面讲的少一点，人权其他这些问题矛盾可能会减少，或者退到次要的地位。

最后，在军事方面，我的看法可能跟许多专家不同。很多人说特朗普上台以后，中美在南海问题、东亚安全问题上矛盾会缓和。我觉得未必。这个未必表现在美国总的战略不会改变。因为美国总的战略是不允许出现挑战美国的一个国家。第二，特朗普要加强美国的军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增加军费，他认为美国军费的削减已经影响到美国的军事优势了。

（节选自其在第 18 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的发言）



特朗普上台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阮大为 (David H. Rank)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使团副团长

我们一直在讲中美的合作很密切，我们想要就全球事务开展合作。可能现在比过去更是如此。巴黎达成的气候协议，全球卫生，还有金融行业的一些合作，这是真正的实打实的合作，可以看到合作领域在不断拓展。我们有一个在全球体系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这是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所以，讲到特朗普的政策，所有的基本面还会继续保持。我觉得这也是美国历届政府和中国政府的一个基点。

2016 年我们看到确实有一个改变。没有人能够像希拉里那样代表“现状”，没有另外一个人能够像特朗普那样代表“变化”。现在美国人民都在探讨特朗普当选以后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对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我不想分析或者是预判他所说的话背后的一些方针，或者是他上台之后做的一些事情对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知道，特朗普总统将会继承如今中美的关系。

（节选自其在第 18 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的发言）





柯伟林

哈佛大学杰出服务教授，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前院长，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主席

这次大选结果对于中美关系与美中商贸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谁也说不准，因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经验仅限于房地产领域，对于当了总统后他到底怎么做，他也做了不少自相矛盾的表态。

然而我建议，我们不应该从字面上去解释他竞选时的说辞。美国大选中，候选人很容易把本国的问题算到别的国家头上或是推卸给外部环境。里根与克林顿总统竞选时都批评过中国，但是走马上任后却能妥善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从卡特总统开始的每一届政府都认识到，虽然中美之间有着政府体系上的根本差异，但中美也有本质相同的利益纽带，最重要的当然是和平与安全保障，而现在还多了唇齿相依的贸易与繁荣。每一届美国政府都认识到，有很多根本影响全球未来的议题，要有中美共同承担。即便大选经常拿中国说事儿，我认为中美共同的担当是不会停止的。即便选举时对贸易发难，我也不认为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会走回头路，或是采取激进的关税壁垒，特朗普说的45%的关税就更不可能了，因为头号反对高关税的就是其他共和党人。

不过我倒希望特朗普能兑现一项没说的那么清楚的竞选承诺，就是带领美国加入亚投行。我认为美国过去这么不情不愿就是大错特错，所以我盼望美国明年就能加入。

我也认为特朗普会欢迎中国到美国投资。如果他真像他说的，要为美国创造就业，那么鼓励外资进入美国是必不可少的。他可以从美国万向集团的投资获得佐证，这家源自中国杭州的企业挽救了也创造了美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现在积极在美国部署电动汽车的生产制造。

如果特朗普真的如他所说要振兴美国基础设施，那么显然应该与世界最大的基础设施建造团队与输出方——中国进行合作。

最后，在安全问题上尤其是朝核问题，中美应当加强合作，推动问题的平解决。

（节选自其在第18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的视频发言）



特朗普上台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蔡洪滨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时任院长

2016年5月份我去美国正是大选激烈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个问题要问，“特朗普的口号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后来我想，这个竞选口号翻译成比较好的中文就是：美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未来中美之间，这两个大国各自有各自的方法。在世界格局动荡经济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两国的关系，不仅对两国非常重要，对世界未来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按照凯恩斯说法，在现在的形势下，人们难免对未来不确定性充满了困惑和焦虑。但是凯恩斯在1930年大危机开始的时候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难是人类快速转变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是成长的困难。阶段性的问题一定会过去，人类美好的时代会到来。二战后60年是黄金时代，我们可能又要经过一段成长的痛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期待长远人类美好未来的希望，同时坚定信心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

（节选自其在第18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上的发言）





颜色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教授

首先，特朗普当选有两大背景值得关注：一方面，美国大萧条以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经济体并没有真正复苏，精英阶层过度沉迷于货币政策，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深层次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过去数十年来，全球化、贸易自由化、人员流动等被视为潮流甚至是金科玉律，其背后是政治正确被强化，中下层百姓的福利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那么特朗普任美国新一届总统，将会产生哪些后续影响？

从短期看，中国经济可能受到一定的负面冲击，但是会展现韧性。

我认为，中国经济受到的影响取决于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他现在很多争议性政策可能是一厢情愿的偏激话语，是否会被落实目前很难判断。但我认为他当选后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再次当选。他之前靠着反传统的政策主张，在美国政治生态丛林中杀出一条血路，所以他为了再次当选必须保持他的独特政策，因此很有可能坚持去推行。

预计他采取的国内经济政策，将更加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重视石油能源行业，重新检视奥巴马医改，将进一步减税，更加强调效率，其经济政策将更趋于现实主义。

对全球和中国经济而言，特朗普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中长期或许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但也不必过于担忧。这是因为：其一，我们可以加强多边合作，在世贸体系下通过多边磋商解决贸易争端；其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越来越多来源于内需，对美贸易依赖逐步减弱。中国经济有相当大的韧性和承压能力。

从全球来看，特朗普当选受影响最大的不一定是中国，而是经济结构单一、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小型经济体。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全球贸易格局或将因此而重新洗牌，旧的贸易和投资格局将被打破，会有很多贸易和投资被转移到中国等其他相对稳健的经济体。

总之，谈论特朗普具体政策为时尚早，但是其对中国以及全球经济影响的不确定性在加大，我们需要充分防范风险但也不必过于悲观。特朗普曾指责中国抢夺美国人的就业，但他也提及中国尊重强者，称赞中国人能干和有雄心。他有他的意识形态，但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和商人。未来美国政策或许依然是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混合体。

（节选自光华管理学院官方微信，有修改）

在App store和
Andriod应用市场
搜索“最光华”



Android



iOS



最光华

你的专属APP

网罗
6000+
EMBA校友

“最光华”——打造北大光华EMBA线上高诚信校友社区

约跑、约饭、约论战，搜索身边校友，行动起来。找人、找乐、找资源，寻找你想找的，应有尽有。等车、等人、等飞机，获取课程资源，一键搞定。谈天、谈情、谈理想，奋斗前进路上，你不孤单。